



劉少奇

新中國

與

劉源 / 著

大風出版社



書 名：劉少奇與新中國

作 者：劉源

編 輯：楊瑩 孟予佳

封面設計：郭鵬

美術編輯：鄭子昌 劉玉瑜

出 版：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11號3樓A座

電 話：(852) 2550 8911

傳 真：(852) 2550 8711

網 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出版日期：2005年12月

國際書號：ISBN 988-98078-3-1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發 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1616室

電話：(852) 2381 8251 傳真：(852) 2397 1519

©大風出版社2005

Strong Wind Press 200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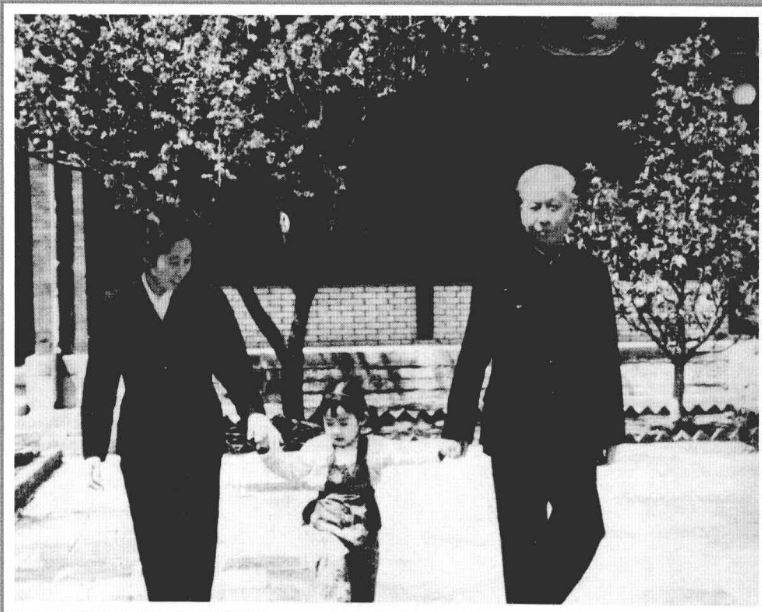
Printed &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劉少奇同毛澤東在中南海。



劉少奇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秋，劉少奇同妻子、女兒在中南海的最後一張照片。

目錄

作者的話	2
引子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
	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張木生 12
代序	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
	肅清左傾流毒 張木生 20
第一章	成功的實踐 33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51
第三章	新民主主義階段
	—— 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 70
第四章	法制與民主的開創者 90
第五章	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 111
第六章	八大路線的光輝 129
第七章	最大的勇敢 148
第八章	可貴的探索 167
第九章	兩手都要硬 187
第十章	務實求真的典範 206
《劉少奇與新中國》校閱後記	何家棟 226
後記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 王小強 232
附 人名表	259

作者的話

劉源

這本書原來是電視理論系列片的解說詞。一個整體謀篇佈局，文字表述，不能不跟著被採訪人的口述和鏡頭畫面走。2002年電視片製作完成之後，本書文字經過多次修改，又與原稿有了許多差別。

按本意，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討建設新中國的理論問題。為了這個探討，1969年，父親被關押迫害致死，全家飽受磨難。作為後代親人，很難做到視角絕對不失偏頗，筆端完全不帶感情。始料不及的是，電視片和劇本在小範圍徵求意見，各種反饋極其強烈，令人感動不已。「死而不亡者壽」。30多年時間過去，不同角度的強烈反響，使我再次清楚地認識到，老一輩全身心投入的偉大實踐，屬於中國共產黨，屬於經歷過反右、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民。書中涉及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為此，就出版之際，補充幾點意見。

捲旗不繳槍

王小強說，「捲旗不繳槍」是鄧英淘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

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的形象一直偏「右」。在「左」傾路線使革命事業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毛、劉兩人分別吃盡了被左派鬥爭的苦頭。在黨內長期政治鬥爭中，毛、劉結合成紅區、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包括劉少奇在「七大」概括的「毛澤東思想」精髓，都是堅持表面上貌似偏「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統一思想，在意識形態上，擺脫蘇聯指手畫腳；在統一戰線中，打破國民黨政府「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束縛；¹ 為日後三年內戰推翻美帝全力扶持的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值得強調指出，這個實事求是的「右」，不僅與言必稱馬列的「左」

相對立，而且與陳獨秀、王明繳械投降的機會主義，具有本質區別。1927年寧漢分裂，為了團結汪精衛堅決反蔣，舒緩對共產黨的戒心，陳獨秀命令劉少奇將武漢三千工人武裝解散或交給國民黨左派政府。劉少奇不同意，又必須執行，結果交了幾條破槍敷衍了事，精銳部隊連人帶槍，送到賀龍和葉挺的部隊，成為後來南昌起義的主要力量。這件事的處理，表現出劉少奇之「右」，與陳獨秀之右的原則區別——捲旗不繳槍。

抗日戰爭期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應當是捲旗不繳槍的經典之作。從形態上說，紅軍與白匪殺得血海深仇，摘下紅五星、紅領章，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出賣原則」再過分也不過如此。把古人說的「反經合道為權」，用到了極致！事情做到如此程度，一片「蔣委員長萬歲」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也罷，蔣介石也罷，誰對誰都不可能再存有一絲一毫的幻想了。「右」得無以復加，體現出「左」得無比堅定。這就是辯證法，也是產生「61個叛徒集團」的路線背景。相比之下，韓信的胯下之辱，劉邦的「分一杯羹」，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兒科了。

毛、劉絕不投降的堅定信仰，建國之後，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進程中，面對一系列新問題，黨內黨外新的各種意見的「左右」之爭。張春橋概括修正主義有「兩個投降」：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毛澤東高舉繼續革命的大旗，反右而後大躍進，「四清」而後文化大革命，最後仍然得面對現實，「抓革命促生產」，起用鄧小平，歡迎尼克松。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大力推行「三自一包」，經濟剛剛恢復，馬上發動「四清」運動。在「一大二公」、普遍饑荒的農村基層引進市場機制，許多幹部多吃多佔，以權謀私，脫離群眾，作威作福。「桃園經驗」證明，一般的調查研究不夠了。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弄虛作假成風，有當地官員前簇後擁，老百姓不敢說實話。必須背靠背「扎根串聯」，才能解除群眾顧慮，瞭解真實情況。不論從現象還是程度上，那時的「多吃多佔」比起今日之腐敗蔓延，恐怕是小巫見大魔了。同樣道理，今天恐怕連「扎根串聯」

都不夠了，祇有深入持久的民主法制，才能約束執政黨幹部以權謀私。同樣出於對貪官污吏的深惡痛絕，毛澤東當時得出判斷，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根子在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全面發動群眾造反的大民主。

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死不改悔的實事求是也好，同源於一個無比堅定的政治信仰。毛澤東的理想追求，更多基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深厚土壤，政治鬥爭不擇手段。從為人民服務的愿望出發，搞到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慘劇，無論如何不能說服人。劉少奇的實事求是，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經濟要運轉，人民要吃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事實。但是，從劉少奇對幹部欺壓百姓的疾言厲色，從劉少奇發動和領導的「四清」運動，從建國以後劉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誠檢討「右」，一次又一次真誠希望跟上毛澤東，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少奇實事求是的所謂「退」、所謂「退夠」，與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不可同日而語。務實而求真。劉少奇堅持的實事求是，仍然是「捲旗不繳槍」的堅定政治信仰。正是因為不僅理解而且認同毛澤東鮮明的愛憎，為人民謀利益的急迫心情，才能理解為什麼劉少奇從來不反毛澤東；才能理解黨內高級幹部對不正常的家長作風、理想主義的浪漫激進，為什麼一再遷就、退讓、姑息，直至釀成文化大革命。

兩手都要硬

毛澤東去世以後，鄧小平改革開放。近30年時間，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分化、物慾橫流、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機，帝國主義張牙舞爪，分裂勢力明火執仗。「六四」風波創巨痛深，黃賭毒黑變本加厲，法輪功呼風喚雨，陳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似的內憂外患紛來沓至。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成克傑，居然成了十惡不赦的貪污犯，問題的性質似乎已經超出簡單的反腐敗範疇。無庸諱言，當年毛澤東不擇手段所要防止的資本主義復辟，許多現象已經預

言式的出現了。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年，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的政治原則，當時針對的是徹底否定建國以後毛澤東思想的潮流。接著，鄧小平又先後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兩手都要硬」。有多硬？連「黨和國家領導人（成克傑）」都槍斃，還能怎麼硬？難道祇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回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全國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藍制服，祇看八個樣板戲，農村三分之一人口餓飯，城裡人吃飯穿衣憑票限量供應，粗糧細米、肉蛋禽魚、油奶醬茶、黃花木耳、花椒大料、糖果布匹、花生瓜子概莫能外，自行車要票，縫紉機要票，手表要票，火柴、肥皂都要票？

充分經歷了左右兩個方向的徹底實踐，可以理解，「兩手都要硬」，是不能走偏鋒，求極端，要的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左右適度的中庸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此之謂也。拿捏火候的分寸，過一點老了，缺一點夾生。電視片中有人感慨當年的「三自一包」，說如果能夠從60年代一路堅持下來，農民的生活注定比今天更富裕。值得思索的問題是如何堅持下來？當年經濟剛剛恢復，劉少奇就發動「四清」運動，放到今天，豈不是典型的「老左反改革」？比起「大躍進」後期的浮腫病，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但是，統計數據顯示，打上每年的物價指數，從1985年以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幾乎停滯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莊、小劉莊、華西村、韓村河、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賣煤賣地「農家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2936元。按一美元兌8.1元人民幣的匯率折算，與國際慣例接軌，全體屬於日均不到一美元的赤貧人口。

中庸之道不等於沒有無比堅定的政治方向。窮人或相對而言的窮人，永遠是人口中的大多數。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面對鐮刀斧頭宣過誓的。共產黨執政的天下，工人、農民淪為無助的「弱勢群體」，明顯具有挑戰性的理論意義。回顧老一輩革命者靠人民的支持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的經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需要工資收入祇

抽得起「大前門」香煙的「平民主席」。學習踐行「三個代表」，共產黨必須為民執政，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則，按劉少奇的話：「革命不是白革了？」

放活民生，狠抓「國計」

在民族振興的問題上，「發展是硬道理」不等於說「掙錢是硬道理」，「發家致富是硬道理」。中國積弱，一盤散沙。過去歷史上，可能的和平環境裡，勤勞節儉的中國人，開餐館都能過得小日子殷實富裕。風調雨順，無為而治，天下太平。鴉片戰爭以後，再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了。李鴻章大聲疾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提出躋身世界民族之林，非強國無以存活的歷史任務。²

從156個大項目到電視片裡所有振奮人心的產品鏡頭，除了房地產煥發出來的高樓大廈（靠國家貸款），統統不是民營、私營、合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市場調節的偉大成果。電視片裡有劉少奇70年代組建托拉斯試點的故事。成立大企業集團，開展企業之間的競爭，比部門行政管理更貼近經濟實際，是劉少奇考慮問題的一個出發點。同時，更具意義的時代背景是，歐洲國家戰略產業的國有化浪潮和蘇聯東歐的托拉斯浪潮，目的都是擴大企業規模，發揮規模效益，與美國大企業的效率優勢相抗衡。

實踐證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飯館、理髮店、修鞋店、小商店等服務性行業，沒有必要統統國有國營。縣辦國營、街道辦集體企業的改革，完全可以多種形式。但是，軍工、石油、大化工、鐵路、造船、航空等等這些過去沒有的戰略產業，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全球資源，割地賠款沒完沒了的背景下，靠民營企業市場調節，是調節不出來的。所以，156個大項目，自主開發的兩彈一星，是共產黨鬧革命的歷史合法性依據。否則，理論邏輯上，共產黨就成了簡單的殺富濟貧，這段歷史就成為多餘的彎路，當初就應當繳械投降，幫忙蔣家王朝搞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臺灣的「經濟奇蹟」證明，祇要條件改變，國民黨也能搞土改。「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本來是三民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祇有共產黨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發揮出史無前例的動員力量，不僅推翻三座大山，而且用最短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完成私營企業市場調節（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蹟」）無法企及的歷史任務。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軍工、石油等戰略產業，就是在美國，也一刻離不開國家的導向、扶持、輸血和管控，仍然是政府高度介入的「國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像日本、南韓一樣，需要政府以更廣泛的產業領域深入參與。更何況，中國從來不是列強刻意幫助的國家，而是「巴統」嚴密防範的對手。如今，割地賠款的國際環境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東歐易幟、蘇聯解體之後，共產黨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不抓強國，單講富民，注定走不了多遠。東部沿海「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參與國際分工，石油、鐵礦等高度政治化的傳統資源越來越依賴進口，13億人口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触及到列強的既得利益，尤其是爭奪壟斷性戰略資源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係。不強國，人家早晚都琢磨著把你給分了！

這20多年，西方軍工和重化工業技術進步突飛猛進，企業規模越兼併越大，戰略產業高度集中，研究開發大規模投入。連波音和麥道都合併起來，阿爾斯通也出入兼併大潮，電腦、IT產業、銀行的合縱連橫就更不足為奇了。市場競爭全球化，企業兼併全球化，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組建大企業集團，振興軍工和戰略產業，是生死存亡的緊迫任務。老一輩辛辛苦苦建立的重工業基礎，包括軍工、重型機械、造船、航空、航太、大型設備等等一般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生產能力，應當發展壯大。在放活民生的同時，狠抓戰略產業之「國計」，是經濟建設方針上，捲旗不繳槍的標誌性體現。

求真務實，強國富民

當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幾乎所有辦公室裡，都掛著毛澤東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³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求真，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務實，艱

苦朴素的工作作風是本色。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堅定，可能採取的戰略戰術越靈活；戰略戰術越靈活，越要堅定求真的政治方向。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低三下四到給夫差嚐大便的程度，反而煥發出強國富民的同仇敵愾。共產黨人所求之真，是為人民謀利益。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強國富民的偉大振興。

在這個政治方向的實踐探索中，過分理想主義，容易浪漫激進，——偏左；過分實用主義，可能拉車不看路，——偏右。艱難複雜的實踐探索中，無論左右，真理往任何一個方向多走一步，都可能變成謬誤。務實忘了求真，定會遷就迷失方向的投降；求真忽略務實，勢必遭受事與願違的挫折，甚至讓人民付出慘痛代價。

在第一線實踐決策加理論探索，搞得不好，很容易兩頭不落好，裡外得罪人，不僅需要大公無私、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而且需要政策界線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智慧，這就離不開屈己從人、任勞任怨的境界修養。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庸之道，不能裝糊塗，打哈哈，和稀泥，當老好人，而是兩手都要硬——左右開弓，既防「左」又反「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⁴

回顧建國以後，劉少奇傾全力推動全面工作的同時，一方面狠抓156個大項目、兩彈一星、大托拉斯，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建立和壯大戰略產業；一方面在城市安撫資本家開工生產，在農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用市場經濟的辦法，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一方面扎根串聯，四清四不清，嚴懲奸商投機倒把，反對幹部多吃多佔；一方面反復提倡黨內民主，積極推動社會法制建設……。劉少奇的主張和實踐，反映出兩手都要硬的客觀要求。這可能是劉少奇建國實踐中，時而表現出「左」、時而表現出「右」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過去偏「左」偏「右」的老幹部，絕大多數站在劉少奇一邊的根本原因。是天災人禍餓殍遍野，讓劉少奇痛心疾首，下定決心，死

不改悔，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⁵ 同樣，是十年浩劫滿目瘡痍，讓中國人民痛定思痛，毅然決然，一百年不動搖，堅定求真務實的指導原則，走向新時代！

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抽象概念化的理論爭論曲折婉轉。從建設新中國的直觀看問題，能夠帶來民族振興的產品，是軍工、石油、三峽、大化工、飛機、造船、重型機械、大型電網電廠，是鐵路、航運、電訊、環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礎設施，是由南水北調全面展開的西部大開發。日本、南韓的經濟振興，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業。雖然已是不同於西方的東亞模式，畢竟還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中國戰略產業的脊梁骨幹，從蘇聯援建156個大項目開始，發展到「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完整體系，靠的是國有國營的自主開發，靠的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功、人均GDP已六七倍於昨天的今天，我們在繼續提高效率之時，是否要給付出巨大代價的「弱勢群體」和流血流汗的勞苦大眾「分分紅利」了呢？在公平致富之中，我們是否需要給改革的主導中堅——國有大企業「擴擴股份」了？深化改革，以民為本，建立13億人共同小康的和諧社會，恐怕沒有比這更突出、更重要的內容了。

一大二公，普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盤散沙，唯利是圖，也不是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搞活民生的基礎上，在對外開放的國際競爭中，煥發國有大企業的新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捲旗不繳槍還是繳械投降，淪落成胡傳魁式「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實用主義，這就是試金石。求真務實，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手放活「民生」，一手狠抓「國計」，強國富民的歷史任務統籌兼顧，是我們應當持續探索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感謝張木生為本書寫〈引子〉，並提供1981年的文章作為〈序言〉。感謝王小強，同意把1979年的文章當成本書的〈後記〉。張、王二位，曾為改革開放的先鋒「智囊」。在那時的政治氣候中，他們「右」

得夠噲，現在似乎又「左傾」了，我想這完全符合歷史的辯証法。用張木生的話說，無論當時文章寫得怎樣，我們獻身改革開放，不是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投降；我們參與撥亂反正，不是返回蔣家王朝、美帝慣例，而是重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正；我們倡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昨天的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終一貫，都是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方向。恐怕沒有人會檢回文革的口號和大棒。我們今天的「左傾」，是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繼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劇，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蘇聯東歐解體易幟的大災難！

電視片的製作和這本書的寫作修改，從頭到尾，是一個集體參與的創作過程。衷心感謝何家棟（原工人出版社副社長）為電視片和劇本的寫作，投入巨大精力，並為本書寫了〈校閱後記〉。衷心感謝薄一波（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谷牧（原國務院副總理）、劉傑（原二機部部長）、楊波（原輕工業部部長）、吳冷西（原新華社社長）、于光遠（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與父親在不同時期共過事的老同志，和身邊工作人員。衷心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中央聯絡部部長戴秉國等在任領導（當時）和史學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老師們、同志們。衷心感謝《中國青年報》記者郭家寬、部隊作家海波、武警出版社副社長李安東、武警影視中心周家戎和幾家劉少奇紀念館的朋友們，積極參與和投入本書寫作與電視製作。

本書的寫作修改，認真學習和參考了楊尚昆（原國家主席）、薄一波（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鄧力群（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許多老一輩的回憶和評述，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感謝香港東海集團董事長黃楚標獨家贊助電視片製作。感謝香港大風出版社為本書出版所做的編輯工作。

2005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6週年

註釋：

- 1 開羅會議，中國名列「世界四強」，廢除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全民統一抗戰。蘇聯希望中國抗戰拖住日本，王明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國民黨針對共產黨的獨立自主，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發展，提出「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總裁）」。
- 2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三聯書店1997年，第5頁。
- 3 1938年6月，毛澤東為抗大寫的題詞《毛澤東手書真跡》上卷，西苑出版社1998年，第433頁）。
- 4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右第五章）。
- 5 包括發動扎根串聯的反對腐敗的「四清」運動，成為文化革命的序曲。在真理多走一步的關口，毛、劉之間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公開對抗。在以後打倒劉少奇的運動過程中，除了極少數名不見經傳的投機分子，絕大多數老幹部跟不上形勢，統統被打倒。

引子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
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張木生

看了大型理論電視系列片及其電視腳本《劉少奇與新中國——祇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掩卷長歎，浮想聯翩。新中國成立後，那一樁樁、一件件重大歷史事件，像過電影一樣讓你熱血上湧，怦然心動。

1968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如火如荼的瘋巔狀態，中國的歷史掀開了悲慘世界中的最不光彩的一頁。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在萬馬齊喑的文化沙漠之中，戕賊人性和破壞文化成為全民族的盛大節日。當時，我在內蒙插隊，劉源在山西插隊，在遠離政治漩渦的邊緣，卻湧動著知青文化的新思潮。

黃泥小屋，青燈一盞，天下第一快事，雪夜無人讀禁書，那時讀書的情景又一次次浮現在眼前。儘管那時書很少，人也很年輕幼稚，為了回答心中澎湃如潮的苦惱問題，一邊咀嚼文字，一邊品味人生，那才叫莫大的享受。而現在坐擁書城，大多數卻盡是油墨垃圾大爆炸，真是迥然不同。生產隊裡廣大貧下中農啼飢號寒，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他們對你說：「想『社會』，盼『社會』，『社會』來了硬受罪。」「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破小襖，20多年過去了，叫人咋說共產好？」我們當時的生活極單調，每天都是「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個小時抓大事。」而聽貧下中農憶苦思甜時，他們不經意地說出，「最苦苦不過六零年」。驚愕之後，催人猛醒，令人思考。

面對著慘淡的人生和為新中國奮鬥了一輩子的父母親友被關進牛棚迫害致死的現實，當我第一次讀了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包括毛澤東在劉講話時的不斷插話），眼前突然一亮，這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親歷的實踐轉化為直覺，劉少奇對了。順著當時對劉少奇的批判「六二年的右傾和六四年的形左實右」，「鞏固

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什麼「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對照《哥達綱領批判》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的提法，《列寧全集》25卷至33卷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和新經濟政策學說，馬克思和列寧所堅持的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是「三階段論」而不是通常流行的由斯大林灌輸給我們的「兩階段論」。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的論述，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昇華同現。自由自在地讀書，東拉西扯地聊天，使我在1968年底寫出了《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問題的研究》。拙著迅速在全國知青中形成了手抄本，至今仍被幾十本研究當年思潮的著作反復研用。為了這篇著作，我曾嚐過「社會主義」的鐵窗滋味，但至今甘之如飴，毫不後悔。就對資本主義之批判這一點，我今天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態度之堅決，心安理得，超過最老牌的帝國主義。

以今天的水準，重新思考劉少奇的理論和實踐，思考他究竟說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不是為了追求非此即彼，二律背反，重講好人壞人的故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而是經過歷史沉澱，回頭看更為了向前看。

第一，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和馬克思、列寧「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學說一脈相承。說明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有一個獨立的從前者到後者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長短取決於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經濟落後的後發型國家，過渡時期將相當長久。所以，他的學說首先是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這是它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不同的地方；但它又不僅僅是一般的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而是關於全體人民解放條件的學說，它並不以全體人民要求解放的主觀願望為轉移，而是以這些願望賴以實現的客觀條件為轉移，這是它與各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不同的地方。他始終堅持一種客觀的歷史觀察方法，並把自己的全部理論都建築在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分析之